

理论动态

(第 251—268 期)

第十四辑

人民出版社



理论动态

(第 251—268 期)

第十四辑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内部读物
注意保存

人民出版社

本书所引某些尚未正式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言论,请勿公开引用。
汇编时部分文章原作者作了个别文字改动。

理 论 动 态

(第 251—268 期)

第 十 四 辑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6开本 9.25印张 155,000字
1981年6月第1版 1981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000

书号 17001·87 定价 0.80元

(内 部 发 行)

《理论动态》汇编本发行办法

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编印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因印数有限，不能更多地应有关部门和有关同志的要求赠阅，由本社出汇编本。

《理论动态》汇编本分辑出版。1977年的第1—34期为第一辑，1978年起，每季汇编一辑。

《理论动态》汇编本的收订和发行工作，由省、市、自治区和地、县新华书店内部发行部门办理。发行对象主要为县级以上各级领导干部，省、地、县各级各部门党校、大专院校的教学人员，各级宣传部门、科研单位、大中型工矿企业和部队系统的理论工作者。以上单位或个人均可订阅。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八一年三月

目 录

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	本刊评论员 (1)
全党同心同德力争财政情况迅速好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4)
谈“退却”·····	崔佩亭 王兆铮 (11)
对宗教方面的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认识与体会·····	赵朴初 (15)
关于稳定市场物价的问题·····	刘卓甫 (30)
关于我国农业集体化的几个问题·····	杜润生 (39)
更加自觉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的路线·····	本刊评论员 (50)
从经济效益看联产责任制·····	欧远方 (56)
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	本刊评论员 (63)
如何抓好今年的经济工作·····	本刊评论员 (69)
作家的社会责任和作品的社会效果·····	卫建林 (74)
如何防止灾难性历史的重演?·····	吴江 (83)
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清理“左”的思想·····	本刊评论员 (99)
谁是当今世界和平的主要敌人?·····	本刊评论员 (103)
下决心扫除形式主义·····	王纪新 (112)
怎样使我们的认识更全面些·····	邓力群 (116)
以高度的热情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	本刊评论员 (125)
谈经济建设中的左倾错误·····	本刊评论员 (134)

马克思为封建官僚画像

本刊评论员

同业公会**是**官僚机构的唯物主义，而官僚机构则是同业公会的**唯灵论**，同业公会构成市民社会的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则是国家的同业公会。

官僚精神就是“形式的国家精神”。因此，官僚机构把“形式的国家精神”或**实际**的国家无精神变成了绝对命令。官僚机构认为它自己是国家的最终目的。既然官僚机构把自己的“形式的”目的变成了自己的内容，所以它就处处同“实在的”目的相冲突。因此，它不得不把形式的东西充作内容，而把内容充作形式的东西。国家的任务成了例行公事，或者例行公事成了国家的任务。

官僚机构的普遍精神是**秘密**，是奥秘。保守这种秘密在官僚界内部是靠等级制组织，对于外界则靠它那种闭关自守的公会性质。因此，公开的国家精神及国家的意图，对官僚机构来说就等于**出卖**它的秘密。因此，**权威**是它的知识原则，而崇拜权威则是它的**思维方式**。

官僚精神纯粹是一种耶稣会的精神、神学的精神。官僚是国家的耶稣会教徒和神学家。官僚机构是〔国家祭司〕。

官僚政治是一个谁也跳不出的圈子。它的等级制是**知识的等级制**。上层在各种细小问题的知识方面依靠下层，下层则在有关普遍物的理解方面信赖上层，结果彼此都使对方陷入迷途。

对于官僚来说，**真正的**科学是没有内容的，正如现实的生活是毫无生气的一样，因为他把这种虚假的知识 and 这种虚假的生活当做真正的本质。

……官僚把现实的生活看做**物质**的生活，因为这种生活的精神在官僚机构中

有其独特化的存在。因此，官僚机构必须使生活尽可能物质化。

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的同一表现为以下的形式：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

就单个的官僚来说，国家的目的变成了他的个人目的，变成了他升官发财、飞黄腾达的手段。

以上这些话，都是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00—303页）一书中摘引的。这篇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比较难读，但是这几段话只要认真多看几遍，还是可以弄懂的。这些话，言简意深，把普鲁士封建专制国家的本质和基本特征揭露出来了，给历史上存在过的封建官僚政治画了一幅像，实在值得一读。

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还是一个政治上不统一、经济上很落后的封建专制国家，封建关系盘根错节。当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在英、法等国开始取得统治地位的时候，德国社会还在沉睡中。所以，马克思说，“德国并不是和现代各国在同一个时候登上政治解放的中间阶梯。甚至它在理论上已经超越的阶梯，它在实践上还没有达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这个时期，支配德国的国家哲学是黑格尔学说，而按这个学说的保守的反动的政治观点，普鲁士的社会政治制度被认为是历史发展的最高成果，普鲁士君主制是最良好、最完备的制度，这种封建等级制和官僚政治的存在是必要的，是“绝对观念”的体现。黑格尔的社会政治观点，是忠实于普鲁士君主制度并为它服务的，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妥协、甘心向国王屈服的意识形态的集中表现。马克思着手批判这个学说的前后，正是欧洲各国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和革命运动日益成熟的一个时期，好多国家人民群众反对封建专制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有些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登上历史舞台，开始了反对资产阶级剥削制度的斗争。在这种革命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下，社会生活日趋活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成立各种团体，以讨论哲学、宗教等方式，抨击普鲁士的现存制度。这标志着欧洲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中心已经转移到德国，德国处在革命的前夜。德国的资产阶级很软弱，他们强烈要求统一，废除封建制度，但是又害怕人民，害怕革命，认为革命是“无理性的，野蛮而可怕的”（黑格尔语），宁可屈服于封建贵族，希望他们从上到下地实行改良，使封建经济转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也就是希望保持现存的君主政体和市民社会的秩序，由国王代表国家从上面赐给他们恩

惠和雨露阳光。最好国家的形象就象他们的同业公会那样，为他们谋利益。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这种希望，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奢望。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在官僚机构中，国家利益和特殊私人目的同一表现为以下的公式：国家利益成为一种同其他私人目的（指人民的利益）相对立的特殊的私人目的（指封建官僚们的利益）。”简而言之，官僚机构实际上是只听命于君主一个人的，确切地说，他们只为属于他们封建官僚政治圈子里的人谋利益，其他的芸芸众生全不在话下，都不过是一堆“被支配、被统治、被占有”的“没有定型的东西”。（黑格尔语）所以，马克思说，“在普鲁士，国王就是整个制度；在那里，国王是唯一的政治人物。总之，一切制度都由他一个人决定。”这种制度的“原则总的说来就是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2、411页）这就是马克思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封建专制国家最本质的特征。

至于封建官僚的其他种种特征，比如闭关锁国，故作神秘，迷信权威，等级森严，上推下卸，弄虚作假，例行公事，形式主义，不讲科学，追逐特权，图谋私利，贪图享受等等，马克思都作了生动的刻画，勿需我们多说了。

马克思对当年封建官僚的描绘，对我们说来已经是一幅历史画卷，但是同时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象手术台上的无影灯，可以帮助我们看清、看准我们自己的问题。不久前，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曾经坦率地告诫全党，官僚主义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在我们的内部事务中，或是国际交往中，都已达到无法容忍的地步。为了克服官僚主义，小平同志提出要改革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这个重大的战略决策，将会在我国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马克思当年揭露的封建官僚是封建社会制度的固有之物，是它的头脑、心脏、神经，是这个制度本身不能克服的。所以马克思对它用的“不是解剖刀，而是武器”，还提出这样的著名结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他号召“应该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只是它不完善，它在实践中，我们的一些弊端是同这种不完善有关的。比如官僚主义现象有的就是这样。而有的则属于我们一些同志的思想作风、党性修养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对待这种官僚主义，是用解剖刀，掸子，洗涤剂。有的动手术，割去健康肌体上的“赘瘤”；有的除尘去垢，使其重放光辉。总之，克服官僚主义是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251期，1981年1月5日）

全党同心同德力争财政情况迅速好转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经济形势一年比一年好。但是最近两年,财政赤字很大,这对安定团结、实现四化,是个严重障碍。需要全党同志在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下,同心同德、步调一致地全面实行和坚决贯彻调整方针,才能争取财政收支平衡,避免可能出现的严重后果。

去年赤字远超过预料

五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1980年国家预算,列入赤字80亿元,估计执行结果可能比原预计大得多。赤字扩大的因素,主要是:外贸部原打算不赔不赚,现在估算要亏损30亿元;猪肉削价、防涝防汛、追加支出17亿元;因1979年物资储备价款已全部上交财政,1980年增拨储备资金19亿元。

1981年概算,原列赤字50亿元。如果根据原来的情况测算,赤字将扩大到约160亿元。赤字扩大的主要因素是:由于原油、煤炭减产和其它一些产品计划指标调低,减少财政收入25亿元;由于1980年农业歉收,粮食统购基数调低,要相应地增加超购加价收进、平价销售的粮食100亿斤,由此增加粮食经营亏损10亿元;由于国际市场粮价上涨,外贸亏损增加,预计外贸亏损额将比原概算增加44亿到60亿元;人代会后,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在预算外增加支出28.76亿元。

根据以上计算,如不采取有力措施,1980、1981两年赤字将达到300亿元以上,连同1979年的170亿元,三年合计在500亿元左右。应当指出,还有些因素没有考虑在内,例如:原来预计,1980年地方财政有结余20亿元,而不久前召开的财政厅局长会议各地报告数,不但没有结余,而且还将有24.8亿元的赤字,这一进一出比原预计差40亿元;1980年各地扩大企业自主权,使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约19亿元;各地批准减免的税收约11亿元;增加机构人员编制和提高开支标准、增加补贴等,

比原预算和概算多24亿元。仅这四笔,就少收多支100亿元。这是可以预计到的。还有不可预计的。例如:由于1980年农业歉收,歉收地区收购不到农产品,而丰收地区超购要加价,这样,农业原料价格上涨,要减少工业利润。近年来基本建设新增生产能力投入生产后,由于没有原料、缺乏能源,因而开工不足,每年都要增加一批亏损企业。仅1980年上半年就新增亏损企业3169户,亏损额2.58亿元。

连续三年可能出现500亿元左右的巨额赤字,这在我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1952年发生赤字,动用结余20亿元,市场没有发生影响。1956年失误,仅发生赤字18.3亿元,就引起市场动荡。“大跃进”三年,我国经济遭到严重挫折,但直接核销的财政资金也只有300亿元。现在,通货膨胀之势正在形成,市场物价已经很难控制,街头巷尾,人人谈物价,户户怨涨价。这是财政危机通常出现的症候。如果不采取坚决有力的措施,财政赤字扩大的趋势就遏止不住,赤字财政持续的时间还要延长,那样,后果将不堪设想。

发生赤字的根本原因 是基本建设超过国力的可能

粉碎“四人帮”以后,人民政治情绪高涨,经济恢复较快。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头脑发热,认识不到国民经济已经走到崩溃边缘的严重情况,认识不到过去“左”的错误,不是大力去调整国民经济,而是不顾条件地大干快上。1978年预算内基本建设投资,就由上年的260亿元,一下子增到356亿元。“七八”方案就是不顾国力盲目大上的典型。1979年上半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并明确调整是关键,但是,一些部门和地方又借口“骑虎难下”,硬着头皮上,加紧同国外签订合同,或者上大的、下小的,或者假下真上,明停暗不停。这样上行下效,各部门、各地区只顾争盘子(基建投资),要“面子”,扩大自主权,银行也争着发放基建贷款。地方和企业权大了、钱多了以后,也争着搞自己的基本建设。结果预算内的建设项目下,预算外的建设项目上;财政拨款的投资下,银行贷款的投资上;以基建名义搞的建设项目下,又以老企业挖潜革新改造的名义上。这里甩出一块,那里甩出一块,使基本建设规模进一步处于失控状态。

基本建设是一种“在较长时间内取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而在这个时间内不提供任何有效用的产品”的生产活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396页)据调查,

在我国目前条件下，每增加 100 亿元的投资，大体需要增加 70 到 80 亿元的材料、设备和动力，以及 20 到 30 亿元的生活资料。投资规模过大，加上投资结构不合理，势必加剧物资供应的紧张状况，造成社会生产力和物质财富的巨大浪费。据统计，从 1976 年到 1979 年四年内，各项基本建设投资总额 1674 亿元，虽然形成了 1245 亿元的固定资产，但因为投资结构不合理和缺乏能源和原料等，新增加的生产能力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发挥作用。有的只投入，不产出，建成之日，也就是关厂之时。有的开新厂、关老厂，开小厂、关大厂，重复建设，严重浪费生产力。现在，小酒厂、小烟厂、小糖厂、小纸厂、小皮革厂这些新的“五小”工业，正在遍地开花。建成之后，更要同老厂争原料争动力，使经济效果进一步降低。

由于基建投资规模过大，造成原材料、动力和生活资料紧张，企业生产不正常，经济效果下降，使财政收入不能相应地增加、甚至减少，这是造成财政赤字的根本原因。同时，增加消费基金也突破了原定计划，特别是发放奖金失去控制，这就使预算赤字进一步扩大了。

能不能依靠赤字搞四化

有些同志认为，赤字无害，依靠赤字可以搞四化。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赤字无害论”的根据，主要有二：一是 1979 年财政有赤字 170 亿元，经济情况还不照样很好。二是财政赤字在资本主义国家是经常现象，我们的赤字跟美国比是微不足道的，多发点票子怕什么。现在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企业界都愿意借钱给我们，机会难得。为了抢时间，加速实现四个现代化，即使冒点风险也值得。

这两条根据都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979 年财政赤字 170 亿元，是靠动用历年结余的财政存款 80 亿元和向银行借款 90 亿元来弥补的。这两笔钱都减少了银行信贷资金。银行在一年内减少了这么多信贷资金，为什么没有大量发股票，使当年就出现通货膨胀呢？原因基本上有两个：一是 1979 年投放的货币，有相当一部分当年未及投入市场，所以当年城乡储蓄增加了 97 亿元。二是 1979 年进口了粮、油、糖、电视机、录音机、手表等总值 27 亿美元的消费品，可回笼货币 130 多亿元。加上 1979 年农业丰收，所以直到 1980 年上半年，市场还相对稳定。但是，即使有这些暂时起作用的缓冲因素，1979 年也发行货币 55 亿元，社会购买力与商品可供量之间，仍然有较大的差额，部分消费品也

开始涨价。人民群众对此是不满意的。储蓄增加只能暂时起缓冲作用，存户随时都有可能把存款取出来，冲击市场。物资供应越不足，人们越持币待购，这种可能性就越大。1979年进口消费品，是在外汇发生逆差的情况下进口的，等于是向外国赊来的。从1980年开始不仅要还本，而且还要付息。总起来说，1979年的日子，是依靠吃尽历年财政结余、在国内国外增加两笔欠账（储蓄和外汇）和少有的农业丰收的情况下，勉强平稳地度过来的。因为1979年的赤字没有对当年经济生活发生严重影响，就得出“赤字无害”的结论，完全是个错觉。

不错，赤字财政在资本主义国家，确实是家常便饭。在那里，政府为了刺激经济，有时还故意把预算搞成赤字，把赤字财政当作自己的一项政策。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这样做。这不仅因为两类国家本质不同，而且也因为财政结构和经济结构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国家，工商企业投资、生产和流通的经营，基本上是资本家私人的事，支出和收入都不纳入国家预算。国家预算基本上只包括政府的收支。在我们的国家，基本建设投资和流动资金拨款，直接由预算支出，而且是预算中最大的两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的赤字预算对整个经济生活的影响，比资本主义国家赤字预算的影响要大得多。在资本主义国家，当经济不景气，市场商品过剩时，资本家投资就不积极，社会上就出现资本过剩。在这时候，资产阶级政府搞点赤字预算，依靠发行债券，确实可以吸收部分过剩资本，投入一些公共事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赤字预算可以对经济起到一些刺激作用。但是，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赤字时，通常的办法是通过国家银行向市场投放货币，造成通货膨胀，以转嫁财政赤字。他们这样作，得益的是资本家，受害的是广大工薪劳动者。现在，通货膨胀是许多国家的政府和人民都感到头痛的事。因此，每届大选时，所有竞选的人物和政党，差不多都把抑制通货膨胀列入自己的竞选纲领。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和政府人士认识到赤字预算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不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命脉都掌握在国家手里，国家搞生产搞建设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不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感到头痛的事，我们为什么偏偏要去学呢！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顺利，重要经验之一，就是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陈云同志总结的三大平衡的思想，它的核心是财政收支平衡。他说：“只要财政收支和信贷是平衡的，社会购买力和物资供应之间，就全部来说也会是平衡的。”（《陈云同志文稿选编》第45页）“如果我们的财政收支不能平衡，社会购买力和商品供应量之间不能大体平衡，物价就会乱涨，市场就会混乱，这对于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稳定都会带来十分不利的影

响。”(同上第53页)常识告诉我们:不是有纸币就有财富,只有在有物资作保障的条件下,纸币才能代表财富。过去的经验证明,在经济困难时期,增发10亿元的货币去增加人民的间接负担,比向人民征收10亿元税款的直接负担,还要厉害,还要沉重。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由于政治上、经济上的反复折腾,我们在人民生活方面,已经欠了很大的一笔债。现在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只有705元,相当一部分职工生活很苦,靠补助等收入拉扯着过日子。如果不严格控制赤字,而是进一步搞通货膨胀,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职工依靠现在的工资收入无法维持最低生活。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决不应当这样作。人民也不会允许我们这样做。

我们自己的资金、物资不够,打赤字预算,向外国借款,行不行?也不行。借外债不仅利息很高,而且利用外资引进的设备、技术,国内要有相当的配套能力,要有相应的“基础结构”,包括交通运输、海港码头、配套企业、市政建设、职工宿舍等,这些都需要大量的国内投资。有人曾经设想,利用外资,可以同国内脱钩,同预算脱钩,实际上脱不了钩。1978年,幻想脱钩成套引进的22个大项目,现在就成了大包袱。实践证明:不可能依靠赤字预算,从外国借来或买来一个现代化。向外国借款,也必须纳入预算,进行统一的收支平衡。

还有的同志说,我们有强大的社会主义政治与经济力量,能够控制住物价上涨,这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决定物价上涨的因素,是购买力超过商品供应的可能。人们手中有钱买不上东西,就到处冲击市场,无法应付,用单纯行政手段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或者说只能控制物价于一个时期,长期控制不使上涨是不可能的。

全面实行和坚决贯彻调整方针

争取财政收支平衡的根本出路,是从量力而行的指导思想出发,全面实行和坚决贯彻调整方针。

首先要大力压缩和控制基本建设总规模,这是恢复国力和建设的平衡,压缩赤字、稳定经济的关键。应按照“先生产,后基建”、“先挖、革、改,后新建”和保证煤、油、电、运、住宅和必要的科教文建设的原则,对所有在建项目进行排队。“七八”方案要大下,重复建设一个也不能搞。其它项目,凡是没有资源、能源,或地质、水文条件不具备,或设计不合理、工艺落后的,也一律停建。所有的基本建设投资,包括

国家经委现在掌握的那部分折旧基金，人民银行发放的基建贷款，都要纳入基建总规模内统一平衡。压缩投资规模，不仅可以直接压缩财政支出，而且可以腾出更多的煤、电、油、运和原材料来发展生产，增加收入，这样就为稳定经济创造了条件。

在压缩基本建设规模的同时，要加速生产调整，消灭经营性亏损。当前，机床、汽车、轴承、锻压件、卷烟机械、造纸机械、制糖机械等产品重复生产现象仍然十分严重。这些产品或是没有销路，或是质次价高，有许多积压起来，白白浪费了国家的原材料和动力，应当坚决调整。消灭经营性亏损，喊了多年，但亏损仍然不小。从今年起，要对那些因为消耗大、管理不善而发生经营性亏损的企业进行彻底整顿。对那些整顿后仍无盈利可能的企业，要坚决关、停，由国家发给职工基本工资。

经济改革要继续进行，但是，一定要处理好改革和调整的关系，改革要服从调整。有些改革尽管从长远看是有利的，但目前却同调整发生矛盾的，要放慢或暂缓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不是单纯扩大企业利润分成比例，主要是扩大职工当家作主的权力。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办法和批准程序进行。任何部门、地方和企业，都不能借口扩大自主权，自行减免国家税收、自行提价，随意侵占、挪用或截留国家收入。

这两年，由于体制改革，权力下放，地方和企业钱多了。为了压缩赤字，避免地方和企业用这些钱来冲击国家预算和市场，国家要明确规定企业资金使用的方向和限额。还要采取一定的借贷形式吸收地方、企业的一部分剩余资金，用于国家急需的事业上去。

要精兵简政、继续节减行政费用开支和国防开支，控制出国访问，节省外事活动开支。现在，平均每个出国访问人员大约花人民币 1 万元。一些单位以种种借口，轮流出国游山玩水，这种歪风必须坚决煞住。批准出国的单位要负起责任，不能随便放行。

在目前情况下，改善人民生活，包括建设住宅在内，都要量力而行。依靠发行纸币来改善人民生活，只能给人民帮倒忙。据匡算，1980 年发放奖金总额达到 80 到 90 亿元，比预算列入的财政赤字还要多。整顿奖励制度，纠正滥发奖金和发奖无控制现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

国家预算或概算一经人大通过，就具有法律效力。政府除可以动用总预备费安排支出外，收支的调增、调减，应当报请人大常委会批准，任何领导人个人无权追加支出或调减收入。各部门、各地区不要随意给领导人乱出增支减收的难题。凡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在总预备费以外的减收增支，财政部门有权拒绝执行。

为了贯彻调整方针,我们一定要加强经济立法和经济纪律检查工作,努力克服经济法制和经济纪律松弛的现象。

注:这篇文章请勿翻印或转载,文内数字请勿公开引用。

(第 252 期, 1981 年 1 月 10 日)

谈“退却”

崔佩亭 王兆铮

抓好调整,是当前经济工作的中心。要把严重失调的经济比例关系调整过来,必须有退有进。“退”,是顺利实现调整的必要措施之一。只有该退的退了,并且退够了,才能保证该进的进,也才有可能逐步实现国民经济协调、健康的发展。因此,如何正确地看待“退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在战争中,“退却”和“进攻”一样,都是常有的事。不仅失利的军队需要退却,就是胜利的军队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有时也要实行某种退却。这种退却,是要避弊趋利,选择有利的时机和阵地,变被动为主动;是要重新部署力量,扬己之长,攻敌之短,使主观的指导与客观的实际相符合,以克敌制胜。正确的退却,往往成为胜利进攻的前提。主动的有组织的退却,正显示了指挥员的明智和驾驭战争发展变化的能力。

在经济生活中,实行“退却”,也是常有的事。二十年代苏维埃俄国由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就是一种正确的退却。这种退却,纠正了向共产主义冒进的错误的政策,实行了一系列旨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巩固工农联盟的方针和措施,从而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国六十年代初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种退却。这种退却使我国的国民经济从“瞎指挥”、“共产风”所造成的巨大灾难中挣脱了出来。历史已经证明,这类退却,是兴利除弊、转危为安的正确决策。

我们这次调整,意味着某些方面的后退,而且要退够,因此,它在这个意义上也是一种主动的有组织的退却。我们讲“退”,主要是指基本建设投资要减少,各项开支要压缩,超过能源和原材料供应可能的加工工业要控制,过高的生产指标要降下来。目的是要稳定经济,消灭赤字,使财政收支达到平衡,并进而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的经济长期存在的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我们的调整,是清醒的健康的调整,是要站稳脚跟,稳步前进。因此,我们的“退却”,并不是简单地后撤,而是有退有进,以退保进,以退促进。这种退却的积极意义还在于,它是要进一步贯彻三中全会所

确定的路线和方针,对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顽症动大手术,以实现建设方针的根本转变。它对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积极作用,人们将会日益深切地感受到。

同军事上的退却一样,经济生活中的退却,在它尚未充分地显示自己的积极意义之前,也会使一些人迷惑不解,乃至产生惶恐不安的心理。当年苏维埃俄国的退却,曾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在国内,有人提出:宁肯受冻挨饿,也决不愿意搞国家资本主义。伤心的,骂街的,或明或暗抵制的,都有。一些在共产国际工作的兄弟党的代表竟嚎啕大哭,他们感到不可理解的是:以埋葬资本主义为己任的革命突击队,怎么能停止进攻、在国内允许商品买卖并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拉关系呢?列宁把这种见解称之为“感情的社会主义”。他解释说,退却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我们犯了一系列的错误”,“我们做得超过了理论上和政治上所需要的限度”。列宁一再强调,实行退却是要从“俄国目前的生产力状况”出发,是“要同无比广大的群众、即同农民群众一道前进”。列宁对这种“退却”的实质和意义所作的透彻说明,对于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由于左倾路线长期占据着支配地位,给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主张扣上“右倾保守”的帽子,给必要的退却横加“复辟倒退”的罪名,也成了一种“传统”。五十年代就有过反冒进和反“反冒进”之争。六十年代以后,“退却”更是成了罪孽深重的字眼。不应低估这种“传统”的影响。三中全会所确定的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的方针,两年来,不就受到或明或暗的抵制吗!有些同志看不到左倾路线给我国的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造成的巨大灾难,不懂得过去那条老路不能再走下去了。他们对“调整”三心二意,甚至顶着不办,使两年来的调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多年来,在我们的队伍里流行一种观点,即所谓“革命就是进攻”,在建设上急于求成。从这种观点出发,有些同志一心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生产关系的变革要越快越好,基本建设的项目要越多越好、越大越好,而且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只能“上马”,不能“下马”。他们认为,这才是革命。至于这种“大干快上”的经济效果如何,是否符合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是否有利于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和人民生活的逐步改善,却很少考虑,甚至不屑一顾。这些同志不了解,无论进攻还是退却,都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一定目的的手段。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只能有一个目的,这就是为人民谋利益。这种利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不应当是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如果这种“进攻”背离了人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主义经济的客观规律,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从根本上说,也就达不到革命的目的。因而谈不上是什么“前进”。相反地,从“死胡同”里退出来,转上正确的轨道,才真正是前进。